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 编

马学良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 XUELIANG

下卷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 编

马学良文集



民间文学
与民俗学篇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 四十年民族民间文艺采风录/1
- 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7
- 少数民族文学纵横关系论/13
- 略论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25
- 民间文学研究的科学态度/33
- 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44
- 关于忠实记录的问题/57
- 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翻译/60
- 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翻译问题/67
-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74
- 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学科性/79
- 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87
- 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语言学、民族学的关系/98
- 再论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的关系/108
- 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简史》想到的/122
- 中国民间故事分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27
- 开创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课题——试论少数民族的诗歌格律/138
- 满族文学宝库的一颗明珠——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满族古
神话》/161
- 关于苗族古歌/164
- 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170

《白狼歌》中的《倭让》考/180

《楚辞》研究小议/186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190

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学研究/195

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关于民俗问题的反思/217

对民族风俗要采取科学的态度/220

古礼新证/222

民俗学与语言学/230

论民俗语言/233

民俗学、民间文学和语言学/257

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268

历史的足音/272

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282

痛失益友——悼念傅懋勍同志/286

追念万斯年先生彝区访书遗事/288

我的一生/293

年表/322

著述目录/328



Contents



A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of Ethnic Groups for 40 Years/1	
The 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7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Literatures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13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Literature/25	
Scientific Attitude in the Studies on Folk Literature/33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Folk Literature of Ethnic Groups/44	
About Faithful Recording/57	
The Translation of Folk Literature of Ethnic Groups/60	
The Translation of Folk Literature of Ethnic Groups/67	
On the Respect for the Folkways and Customs of Ethnic Minorities/74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the Studies on Folk Literature/79	
Folk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Ethnic Minorities/87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Folk Litera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98	
On Folk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Ethnic Minorities/108	
Thoughts from the Compilation of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122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Classifications of Chinese Folk Tales/127	
A New Project for Studies of Literature of Ethnic Groups—on the Rhythms of Ethnic Classical Poetry/138	
A Bright Pearl in the Treasure-house of the Manchu Literature—On the	3

- Ancient Mythologies of Manchu by Aisin Giorro Urallxichun/161
- On the Miao Epic/164
- Miao People's Colorful Life in the Ancient Times/170
- Validation of "Lou Rang", a Part of the Poem Series "White Wolf Song"/180
- An Essay on Studies on Tsu Verses/186
- To Establish Folklore Stud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90
- Folklore Studies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195
- Commemoration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 Movement --A Reflection on Folk-custom Issues/217
- Folklore Studies Demand Scientific Attitudes/220
- New Validation of Ancient Etiquettes/222
- Folklore Studies and Linguistics/230
- On Folk Language/233
- Folklore, Folk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257
- Some Stories about Wen Yiduo Collecting Folk Songs in Western Hunan Province/268
- The Voice of the History/272
- To Mourn for My Teacher Li Guifang/282
- Loss of My best Friend -- To Mourn for Fu Maoji/286
- In Memory of Wan Sinian in Yi-inhabited Area/288
- All My Life/293
- The Annals/322
- The Catalogue of Works/328

四十年民族民间文艺采风录

我国古代就有采风制度。《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可知古代采风是为了给天子“观民风”、“补察算政”的。民风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真实反映。历代统治阶级无不重视民间歌谣的采集，这是为了“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而收集的（《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诗三百篇》可谓古代民歌的集大成。

我国历代采风运动，可以说经久不衰，但科学的采集、整理、研究人民创作的民间文艺，还是在近代史上伟大的“五四”新科学运动以后，北京大学继歌谣征集处，进一步组成歌谣研究会，前后共收到歌谣一万三千余首，可谓极一时之盛。

最深刻的变化是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成立，社会制度变了，各民族的关系也变了。党和政府重视发展多民族的民间文艺，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对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提出“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开展民间文艺工作的基本原则。迎来了民间文艺调查研究的春天，尤其居住在全国大半个土地上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向被冷落的民间文艺，也踏进祖国的百花园中争芳斗艳，令人耳目一新。因而有的文学家惊叹地说，“这是开在社会主义早晨的花朵”。

的确，40年来这鲜美的花朵，曾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采集、整理发表了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数以万计，许多民族民间文学，已登上世界文坛的宝座。如彝族的《阿细的先基》、《阿诗玛》、《查漠》、《梅葛》、《勒俄特依》、《宇宙人文论》；瑶族的《密洛陀》；苗族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诗》；壮族的《百鸟衣》；白族的《望夫云》；傈僳族的《逃婚调》；傣族的《孔雀公主》……等民族民间文学，它们宛如天空灿烂的群星，闪烁者赏心悦目的光彩。

史诗是民族民间文学中光辉夺目的民族文化遗产，其中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称为三大史诗。这三部史诗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瞩目。《格萨尔王传》是当今世界最长的一部民间文学巨著，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藏族群峰中的“珠穆朗玛”，已列为国家重点的科研项目。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化生活，成为作家们新的创作源泉。中国许多作家从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成功地创造出一大批新的作品。突出地是以民族民间文学为中心题材，写出许多有民族特点、新内容的电影、戏剧、儿童话剧等作品，如来源于苗族民间故事的《蔓萝花》，来源于傣族史诗的《孔雀公主》，来源于壮族民间故事的《刘三姐》，来源于彝族叙事诗的《阿诗玛》和《奢香》，来源于维吾尔族民间故事的《阿凡提》，来源于藏族民间故事的《青蛙骑手》以及以史诗为题材的《格萨尔王传》、《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大型的历史剧。这些再创作，不仅丰富了文艺生活，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交流，而且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增进民族团结。

另一方面，而且是重要的一方面，民族民间文学对充实人文科学，重建新的人文学科，有填补空白的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偏见，历代统治阶级御用学者，对民族文化一是同化消灭，一是采取鄙视态度。少数民族文化在重重压抑下得不到丰富、发展，因此反映多民族文化的各学科没有他们的适当位置。如过去所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等著作，主要是单一民族的汉族史。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组织编写各民族的史志，如国家民委主编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编纂的民间文学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都列为国家重点科研规划，已陆续出版面世。我们知道，我国55个少数民族大多数只有本族语言，没有本族文字，有自己通用文字的还不到10个，因而编写少数民族的文化史，除参考汉文文献或有本族文字的古籍记载外，主要史料还是来自神话故事、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尤其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一般有内容丰富、较朴实地反映民族发展



历史的口传文学。因而，民间口头文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40年来，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走遍了占大半个中国的民族地区，对各民族民间文学作了初步的普查，通过整理翻译工作，面对丰富的新材料，不仅有文学方面的价值，而且也是研究该民族的历史、语言、民俗、宗教、文化和人类学上的重要材料。恩格斯在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就曾引用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论证社会历史，并多次根据荷马史诗的资料阐述古代希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马克思说：“古代歌谣是他们（日耳曼）的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大多从民间文学的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如托尔斯泰、歌德、普希金，乃至我国的屈原、司马迁等。

二

40年来我国民间文艺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但也走了许多坎坷不平的道路。现在面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时期，我们要对40年民间文艺工作进行全面思考，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做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提出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计划。李瑞环同志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他强调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弘扬民族文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兴衰，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弘扬民族文化，是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顶住一切外来压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弘扬民族文化又是沟通海峡两岸的桥梁，是加深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相互理解，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

在我国，弘扬民族文化是要弘扬多民族的文化，而不是弘扬一个或某几个民族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文化。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各民族都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要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提高民族自尊心，努力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们对待民族的优秀文化固然要继承发扬,除此之外,也不应一概斥为糟粕,我们应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民族文化遗产加以分析批判。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537 页)我们不能脱离“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对待民族文化的遗产。如民族民间文学与原始宗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有些人认为民族民间文学中有“宗教迷信”而否定它的民族性和文艺价值。对此,高尔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尖锐地指出,民间文学中人民的“宗教创造”(即神话)和传统阶级的宗教迷信根本不同:“在我们的世界上,向来都有两种思想、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种是需要神作为完美的模范,作为劳动中模仿的范例;另一种是为了巩固神的不合理的权能,这种神权除了体力以外,在大地上找不到别的给自己辩解的理由。”(《给阿·阿·苏尔科夫的信》)高尔基深刻地阐述了民间文学中的“神”与“神权”思想的区别。于此可知很多民族民间文学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都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这是由于在原始社会里,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尚处于极为蒙昧状态。原始人在大自然面前经常表现出惶惑不解,特别是人民此时还没有把自然界区别开来,把自己与自然界等量其观,这样就产生了对自然界人格化过程,也就具备了最初的原始崇拜的雏形。对自然界的日、月、山、水、风、雨、雷、电,乃至一树一石、一兽一鸟在那时人们的心中都成为有灵气的,有生命的,人格化的神灵和精怪。为了描写、讲述这些神灵和精怪,或者为了崇奉它们,祈求平安,就产生了颂歌和颂词。这种颂歌颂词就是早期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

大量事实证明,在宗教观念笼罩着的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战争,无不受宗教的影响,许多神话既是宗教观念的基础,又是民间文学推广的源泉,二者表里杂糅,难分难解。我们很难在原始社会里找到毫不受宗教沾染的所谓“十分健康”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果有鬼神就设“禁区”,那就等于取消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歌谣等民间文学作品,这是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粗暴表现。而这一阶段的民间文学,恰恰是探讨原始社会的重要资料。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是引用民间神话、故事、传说、歌谣

等论证社会历史的。

我们要把宗教的历史进程分为原始宗教和现代宗教，即物的崇拜到神的崇拜两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显而易见，马克思认为宗教中表现出人间现实苦难，“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这是原始社会通过宗教反映人间现实的苦难，它与后世人为宗教不可同日而语。（详见《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马学良、王尧合写）

为此，我们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提出“全面搜集”，不可以个人主观论断或限于某种原因而加以取舍。几千年来，我们对待民间文艺，曾犯过不少次的历史性错误，如《诗三百篇》，据司马迁《史记》所说，“古代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申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可见诗经编著时，所依据的原材料超过现在的十倍以上。由于孔子编著的主要标准是“思无邪”、“取可施于礼义”者，其余的全被这位卫道士孔子删掉了。《诗经》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在采诗基础上编成的，诗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社会风情等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可惜孔子删掉了不合于当时封建奴隶制的道德、礼义的几千首诗，造成千古的憾事。尽管如此，历代学者根据劫余的三百篇研究古代历史、哲学、文学以及古代语言，做出了不少的成绩，特别是来自民间的十五国风更是民情、习俗的真实写照。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乱国的罪恶目的，把黑手也伸进了民族民间文学的领域，对民族民间文学也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剿。他们宣布“民歌是下流的”，中外闻名的《格萨尔王传》被打成大毒草。许多民间作品被禁绝、焚毁；民间歌手和研究者被批斗、迫害，以至含冤而死。一时间，竟至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令人伤心惨目。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地复苏，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我们提倡“全面搜集”，不是香花毒草不分，精华糟粕不辨，所以，要在“重点整理”中，历史地、科学地去分析批判，而不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民族文化。

三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在老一辈民间文艺家披荆斩棘开辟的民间文艺园地，培养新一代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这是当前的迫切任务。邓小平同志早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就曾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富的成果”。李瑞环同志最近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民族文化工作者，是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根本措施，也是当前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40年来，在民间文艺工作的实践中，涌现出数以万计的民间文艺的优秀工作者，这些人对民间文艺既有深厚的感情，又有实地工作的丰富经验，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给以深造的机会，尤其要重点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因为他们既会本族语言，又熟悉本族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很多人还是本族出色的歌手、故事家。我们应当在与他们协作中，通过实践对他们加以培养，使他们较快地成长起来，这是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骨干力量和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与各种事实生活现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文学材料。”（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民间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口头文学既是靠语言流传下来，那么搜集口头文学就要通过语言作忠实的记录，而且关系到整理翻译好坏与可靠性问题。

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是多科性的学科，它与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学科有密切关系。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具备这些有关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调查研究整理翻译民间文艺，我们要以满腔热情对社会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投身于繁荣社会主义民间文艺的崇高事业中，以不懈的精神，在本世纪最后10年做出更优的成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中国民间文学的新时代》，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



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

一

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里，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悠久、各具异彩的民族文学宝藏，这些无疑都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历来只把汉族的作家、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则很少有人涉猎。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平衡的现象，有其历史的原因（封建时代文人阶级、民族的局限性），也有现实的原因（十年浩劫摧残民族文化的恶果）。今天，作为民族文学的研究者，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给予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以应有的重视，并力促其繁荣和发展。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民族文学的创作与民族文学的研究同步并进，使民族文学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有一个飞跃和提高。

二

要达到这一目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首先要纠正几种不正确的认识，即所谓正本清源，在端正认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去谈如何重视和发展。

有人认为，民族文学就等于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大都是一些俚俗之作，起点本身就比较汉族文学要低，未曾受到重视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毋庸讳言，我国绝大多数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自古至今的文学创作只能是世代口传心授的民间说唱形式，但是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仅仅是在数量上与发达的民间文学相比而显得薄弱，它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很大的，有的甚至不逊色于同时代的汉族作品。辽宁是满族的故乡，我在这

——马学良文集——

里主要想就满族文学的实例来加以阐述。早在金代，满族的前身女真族中就已有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如海陵、金章宗及南渡后的完颜琫、完颜守禧、乌林答爽、术虎邃等人文学造诣都相当高。到了清代，满族中的文人骚客为数更多，其中最有成就的当首推“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顾太清（西林太清）”，他们的诗词不仅在满族人中出类拔萃，有清一代亦堪称大家。此外，像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小说）、昭槁的《啸亭杂录》（笔记散文）等，在各个不同的文学领域中都有满族作家的作品。直到现代，在我国的作家队伍中已涌现出一批数量可观的满族作家群，他们正在以不懈的创造力丰富着满族文学的百花园。各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的贡献是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个方面的。之所以产生上述误解，根源在于对少数民族文学了解得不深、不透。要纠正这种偏见，就必须加强民族文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的培养。这是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另一个问题。

又有人认为，唯有汉族文学的内容才最丰富、形式才最多样。这同样是由于对少数民族文学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而产生的偏见。我们知道，神话和史诗一类文学体裁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相当普遍，而在汉族文学中就不那么发达。比如满族的神话就十分丰富，它包括创世纪神话，满洲始祖的神话，萨满教的神话以及图腾的神话等等，不仅内容丰富多样，数量也很可观。著名的长篇神话《尼山萨满》在满族及邻近民族中有几种变体，而《天池三仙女》的变体竟达十几种之多。诗歌也是如此。汉族的长篇叙事诗古来流传下来的很有限，但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却蔚为大观。在这里我们且不说那些早已为大家稔熟的《阿诗玛》、《嘎达梅林》等，就是锡伯族的《告别盛京》、《三国之歌》、《拉希罕图之歌》及满族的著名长诗《盛京赋颂词》等等，也有的长达数百句。仅从长篇叙事诗这一体裁上来说，少数民族的创作已远胜于汉族，至于英雄史诗如《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这类体裁更是填补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的空白。因此说，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是互为补充，共同繁荣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园地。

三

对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个重新的估价和正确的认识以后，接下来我



就要谈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做任何工作，方法都很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这个道理。重视和发展民族文学的研究首先要进行研究方法的改进，使其科学化。近几年来，民族文学研究者们从邻近学科引进不少新型的研究方法，诸如比较文学研究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研究法等，并开始注意到民族文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等人文科学的多方联系。

首先我谈谈横向的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法本是从语言学中借鉴来的研究方法，它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作用十分重要。我国 56 个民族的文学形态各异，只在有比较的基础上才能显露出各自的特点——亦即民族性。从中往往能够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多有吞果实、卵生的情节，而殷史祖的传说中亦有相似的内容。联想到前不久在辽西出土的夏代遗址，我们似可推测夏商系统的民族当与东北古代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有同源的迹象。

横向研究虽如此之重要，但要真正深入搞下去却有相当大的困难性。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大部分比较研究，只停留在用汉语文创作或翻译出来的作品上。因为要想比较不同语种的文学作品，必得通晓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民族语，只有这样才是实质性的比较。翻译作品无论在风格上还是语体上都势必受到媒介语的大局限；依据译文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也必然会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会极大地影响到比较文学的深入发展。

因此，民族语在民族研究中的辅助作用不可忽视。在一般通用民族语的地区比较易于体会到这一点，但即便是像满族这样的绝大部分地区已不通用本民族语言的民族来说，其作用也同样重要。黑龙江的一些满族村屯中至今仍然通用满语，到那里采风的同志仍能听到为数不少的用满语讲述的故事、神歌、谜语等等，这些正是满族民间文学中最有特点的一部分；保存至今的清代文学作品中有相当数量的用满文创作或翻译的诗赋、笔记、小说等等，这些都是满族作家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等于零。用民族语文学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数量一般要少于汉语文的创作，但民族性的精华集中体现在前者。我们的研究不可失之偏颇，否则就谈不到全面地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常有人说清朝前期的满族文人作品中就已有强烈的汉化趋向了。这是由于以纳兰性德、阿克敦为代表的满族作家群从语言文字到

风俗习惯业已汉化的结果，他们醉心于汉文学，放弃了自己民族的文学形式，采用全盘汉化的手法来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同发达的汉语文作品（满族人创作的）相比，满语文作品可以说从满文创制之初就始终处于劣势状态。这是满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历史造成的客观事实。但在近期，无论从满语方言的调查还是满文古籍的整理过程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迄今为止对这些珍贵材料的使用还仅局限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范围内。我们希望，搞满族文学的同志们尽快重视起来，同时，加紧培养通晓满语文的满族文学研究者，尽早填补上这块空白。

民族语在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的辅助作用更为重要。比如要研究民族诗歌的格律，必须了解那个民族的语言，通过语言分析才能得到诗歌格律的真谛。满族和锡伯族是文字相同、语言各异的两个民族，它们的诗歌在韵律方面彼此有什么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满文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押头韵，即每一诗句的第一个词的首音节（或音素）在同一诗段中通押。形式则有两句一韵、四句一韵乃至多句一韵的。现代锡伯诗则多是押尾韵，形式亦多为四句一韵，韵脚在 1、2、4 句的末一个词的尾音节上。这是明显受了汉诗影响所致，原有的民族形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族诗歌的格律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并不适应黏着语的语法结构。阿尔泰系统的民族的诗歌大都以押头韵为主，这是受其谓语处于句末的语序的制约而形成的。同是押头韵，彼此间又有什么细微的差别？这些不经过细微的比较是无从得知的，而进行比较的条件就是要通晓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学。

横向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注意民族文学与有关人文科学的内在联系。在这里以语言学为例谈谈语言学在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是如何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民族文学研究中去的问题。自本世纪 20 年代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提出“历史比较法”以后，成为当时乃至嗣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要的研究方法。它对民族文学的指导意义在于：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具有亲属语言关系的民族文学，可以辨析它们具有同源关系的文学传承脉络，发展规律及各自的特色。锡伯族在借用满洲文字之前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它的古代诗歌几乎没有流传下来，近现代的诗歌全是用满文创作的，其韵律存在着明



显的杂糅状态，有的押头韵，有的押尾韵，有的头尾韵并押，有的像散文似的不甚押韵。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这些现象，就会误认为它们都处于一个平面上属于同一个历史层次。但当我们对比分析一下满文诗的历史发展规律（押头韵——头韵尾韵并押——押尾韵或不押韵），就会对锡伯族诗韵的历史堆积层有一个立体的明了的认识。再比如我们想知道金代的女真诗韵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研究，发现女真诗有押头韵的，也有押尾韵的，但没有发现头尾韵并押的——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间出现了空格。因为传世的女真文资料极少，我们根据满文诗韵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推断，女真诗韵同样应该经历上述三个发展阶段。到了本世纪 60 年代波兰语言学家库利洛维奇提出“内部拟测法”，使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它同样对民族文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运用内部拟测法，在没有比较客体的情况下，从一个民族文学的系统内部研究其结构上的差异，根据这些差异，将文学历史演变层剖析开来。满族著名的“老罕王的传说”，在东北各地就有不同的变体流传。黑龙江操满语的甲地区讲述的老罕王传说，内容最完整，情节曲折，民俗典故最多，与史实相吻合的地方也最多；黑龙江操满语的乙地区讲述的同一传说，内容已不甚完整，且夹杂不少汉语借词；辽宁地区讲述的同一传说，只保留故事的框架，许多细节已经没有了。这三个地区的传说，不是一个层次中的变体。我们从语词的差异入手，可以探究出其发展演变的时间层次。黑龙江甲地区管痞子叫做 samōa；乙地区叫做 wudzl，辽宁地区已完全用汉语讲述，也叫 wudzl。从语词的汉化过程大体可以构拟出该传说流传的时间层次：黑龙江甲地区——黑龙江乙地区——辽宁地区。但老罕王的传说最初应当是起源于辽宁省的辽阳地区，后来才流传到黑龙江地区的。之所以形成了逆序流传的层次，是辽宁地区自清代中期开始受到的强大的汉化影响所致，强大的汉文化席卷了辽东以后，使这一地区的满族人不仅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同时失去了相应的民族文化。辽东地区的满族文学，形成于汉化以后，因而出现了时间上晚于黑龙江地区的逆序状态。这种因外界的影响而产生的中断的变化在语言学中会呈现不规则现象，给内部拟测法提供重要的研究线索；同样，在文学的发展史上，也需要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从而探究出文学发展的真实脉络。